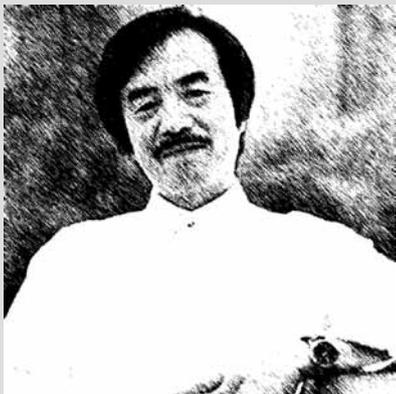


李銳訪問記



撰文：張恆學

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破天荒地頒給了中國籍華文作家莫言。

曾被認為是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位中國作家——李銳，受邀擔任城市文學獎2013小說組評委，並親身蒞臨4月份的城市文學節。諾貝爾文學獎的結果在華人世界轟動一時，於李銳而言更是熱門話題。他對莫言得獎的感想可見於本刊之「小說組交流會」，這篇專訪則避開了李銳分享過無數次的諾獎心得，談的是官方獎勵與藝術的關係、商業化如何影響寫作，及他對年輕作家的看法。

有「官方獎勵」一問，是出於2013年初鬧得香港滿城風雨的「ADC藝評獎事件」。身在北京的李銳雖無跟進相關事件，而其對於官方獎勵一般性的見解顯然更適用於中國大陸，但對香港而言亦不無可以參考的地方。

有「商業化如何影響寫作」一問，是嘗試從宏觀着眼，看李銳如何看待中國的文學前景。而「他對年輕作家的看法」一問，則是從微觀細察，尤其當他的女兒——李笛安也在文壇覓得一席之地以後。李銳到底是如何看待新一代的寫作人的呢？

政府要大度

問：你覺得官方的獎勵能否有效地推動文學創作與藝術欣賞？

李銳：任何於社會有益的事情，政府都有責任做。政府如果想推動文學、藝術創作，它可以出錢，設立獎項。它需要做的，也只能限於「出錢」而不能「評審」。要讓此類文藝獎項發揮效力，評審機構必須具有高度的學術性和獨立性——專業的、不受資金來源影響的。由他們來評獎，政府出錢就可以了。這是最佳的方式。

據我所知，法國的文化部就有這個功能。它知道法國的小劇場話劇沒有穩定的資金來源，觀眾票房收入也比較少，但是它支持——你給我報計劃，我出錢，你只要把結果告訴我好了；當然中間要有審計，錢不能任你亂花。

這個方式我覺得比較好，而不要變成一說就是：政府出錢讓你們做事情，最後你們怎麼能做出個批評政府的東西。

政府應該要大度一些。也許藝術家就搞出了個批評政府的東西，可政府應該一以貫之地支持他。政府支持的是藝術創作整件事情，而不是支持他讚美或批評政府。

自由與藝術原創性

李銳：藝術是最需要原創性的，而原創性是要在自由的氣氛下才能充份發揮的。這是根本性的問題。現在提倡的甚麼中國的「軟實力」，究其根本，沒有自由創作的制度作保證，哪有原創性的作品出來？

比方說，新文化時期——白話文運動，五四運動前後——那是中國文化、文學的黃金期。皇權剛崩潰，北洋政府剛剛建立起來，中國還沒有「大統一」，那是中國最自由的時候——可以隨便發言、可以輕易地辦報紙、辦文學社；那麼多的作家組織成各別的團體，

百花齊放，各有論述、互相批評。

經過這麼一場萬馬奔騰的洪流以後，該淘汰的就自然被淘汰了，脫穎而出的自然就是大師了。於是，我們看見魯迅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沈從文、張愛玲……我們記住的就是這幾個名字。他們只是高山上的石塊，下邊是有巨大的山體托着的。

自由並不是包除萬病的良方。好的作品固然可以通過激蕩而產生，壞的作品也一樣會冒出來。自由只是創造了一個給大家平等機會——發言、討論——的制度。

權利和金錢的雙重專制

問：撇開政治因素不談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，由計劃經濟改成市場經濟，你認為市場經濟如何影響文學創作？以商業為導向的寫作是否會令文學沉淪？

李銳：如果我們做個縱向的比較，中國現在要比文革前後有很大的自由了。現在改革開放已經到了深水區，可是作家們到了深水區就不往前走，很多東西都不去碰觸了。我覺得是不應該的。

實際上，中國已經充份地市場化，要辦雜誌非常難。省作協的月刊有95%以上，都只發行千餘兩千份，而它們都是國家出很多錢在支撐的。除了政府，有一部份資金來源是到處找贊助得來的。這就有問題——我出了錢，我可不能白給。這樣，他們就面臨着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專制。

中國面臨着越來越嚴重的商業化。可商業並不是洪水猛獸，恰恰相反，商業在文學整件事情上很重要。作家把一本書寫出來，只完成了文學整件事情的一半，一半都不到；當作品排版、印刷、擺到書架上，直到有人買了這本書，拿回去打開它閱讀的時候，文學才開始發生。作品使讀者產生了共鳴，文學才完成。

古典四大名著裏三本——《西遊》、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都是

在書場裏誕生的。古時沒有電視、電影，聽人說書就是一種大眾娛樂——交上一個銅板，坐在那兒聽一段說書。「金堂木已拍，且聽下回分解」，說得不好，下回就沒人來了。

文學商業化問題的關鍵在於，出版社為了銷量，組織一批人，為他們量身定做，要他們照着某些路數去寫，甚麼青春小說、學生讀物。之後，這件事情就慢慢地倒回來，資本就在不動聲色地影響人的審美品味，甚至讓人趨之若鶩、製造明星、製造粉絲，於是演變成惡性循環。

任何有生命力的東西，一定會影響很多人。這樣的商品，很快就會失去吸引力和原創性，影響是暫時而有限的。

現在，我們要警惕的是那種為了商業，強制地制定既定的審美取向的事情。中國人不要被權力強迫之後再被金錢強迫，這是一個新的考驗。中國現在面臨着一個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善惡於一身的時代，中國人要警惕的，實際上是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專制。

說到底，世界上還沒有出現過一個為文學而存在的時代。我們要求更多的自由是一回事，作家有沒有自我的堅持是另一回事。真正的作家，是要有長期的自我堅持的。能堅持的作家，才能寫出好作品。

年輕作家不可以小覷

問：你的女兒李笛安也出了幾本書，現在大受歡迎，你是如何理解女兒的文學作品的？放大來看，你如何看待整個新生代的創作？

李銳：曾有人戲言，說：李銳、蔣韻，你們對當代小說最大的貢獻不是你們的小說，而是你們生了一個會寫小說的女兒！

現在的年輕人絕對不可小視。他們有更廣闊的文化背景，按部就班地受教育長大。有一種論調，說年輕作家們沒有經歷過人生的命運起伏。我認為，文學不是非得有大苦大難才能產生的。美國兩

次大戰都置身事外，卻一樣產生了很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——海明威、福克納、索爾·貝婁……現在的年輕人大都有出國留學的經歷，他們吸收的文化養份，使得他們的文化視野相對於上一代人更加廣闊。

我們不需要忙着給所謂的「八零後」「九零後」的年輕作家下定義。一如我所堅持的，年齡並不決定文化觀念的差異，也不決定文學品味的高低。現在很多年輕作家都是很有想法的，只不過一些自以為是的文學評論家和老作家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。

要是文學總是一代不如一代那文學就完蛋了，文學肯定是一代比一代有變化。而年輕作家們能不能產生好作品，只須留待時間來檢驗。